

從後極權到新極權化： 中共政權二十餘年的變遷、習近平體制 及其對台灣的戰略意涵

林佳龍^{*}

摘 要

本文從比較政治學關於非民主政體、後極權主義與政權變遷的研究傳統出發，重新檢視作者於 2004 年《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所提出的分析，並據此說明習近平時代中共政權何以未依循自由化或民主化方向發展，反而出現「新極權化」。本文主張，當年的「退化」主要指古典極權體制之意識形態、群眾動員與領袖統治的鬆動，並不同於國家能力衰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所取得的資本、技術、市場與國家資源，加上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與數位監控的發展，使中共得以在市場化與全球化條件下重建政治控制，形成「發展型後極權」到「新極權化」的非線性演變。習近平體制並非單純回到毛澤東時代，也尚未成為一個穩定、完成的新政體類型；它仍以列寧式黨國為制度骨幹，結合個人集權、國家資本主義、科技民族主義、數位控制與國安治理，同時承受經濟放緩、官僚失能、資訊失真、菁英不安全與接班不確定等內在矛盾。本文據此分析中共政權的變遷路徑、未來情境及其對台灣軍事安全、民主韌性、經濟安全、外交空間與文明敘事的戰略意涵。

關鍵詞：退化的極權主義、新極權化、習近平、中共政權、台灣安全

^{*} 外交部部長；台灣智庫共同創辦人。

From Post-Totalitarianism to New Totalitarianization: Two Decades of CCP Regime Transformation, the Xi Jinping System,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Chia-Lung Lin ^{**}

Abstract

Drawing on comparative politics literature on nondemocratic regimes, post-totalitarianism, and regime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dvanced in the 2004 volume *Future China: Degenerating Totalitarianism* and explains wh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did not continue toward liberalization or democratization but instead moved toward “new totalitarianization” under Xi Jinping. The earlier notion of degeneration referred primarily to the erosion of classical totalitarian ideology, mass mobilization, and charismatic rule; it did not imply a decline in state capacity.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upplied capital, technology, markets, and fiscal resources, while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surveillance enabled the party-state to rebuild political control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The result was a nonlinear trajectory from post-totalitarianism to developmental post-totalitarianism and then to new totalitarianization. The Xi system is neither a simple restoration of Maoism nor a fully consolidated new regime type. It remains rooted in the Leninist party-state while combining personalistic rule, party-state capitalism, techno-nationalism, digital control, and comprehensive national-security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contains serious tensions arising from economic slowdown, bureaucratic paralysis, information distortion, elite insecurity, and succession uncertainty.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CP regime’s trajectory, future scenario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Taiwan’s military security, democratic resilience, economic security, diplomatic space, and civilizational narrative.

Keywords: degenerating totalitarianism, new totalitarianization, Xi Jinping, CCP regime, Taiwan security

^{**}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Co-founder of Taiwan Thinktank.

壹、前言：從政體類型學重新理解習近平時代

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性質，始終是比較政治學、國際戰略研究與台灣國家安全判斷的核心問題。1949年以來，中共政權歷經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極權體制、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的制度化黨國威權、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的集體領導與技術官僚治理，直到習近平時代出現權力高度集中、國安治理全面擴張與意識形態重新強化。這段歷史演變顯示，中共政權不能以單一概念簡化理解，而必須放在政體類型、政權鞏固、菁英政治、社會控制、科技治理與國際秩序變遷的交會處加以分析。

Juan J. Linz 對非民主政體的經典分類，區分極權主義、威權主義、後極權主義與蘇丹式政權，並指出不同非民主體制在意識形態強度、政治動員程度、領導結構與多元主義空間上的差異，將深刻影響其穩定性、壓制能力與轉型路徑（Linz, 2000）。Alfred Stepan 則進一步指出，共產後極權體制的變遷，往往取決於黨內分裂、社會動員、國家能力、國際環境與民主反對力量之間的互動（Linz & Stepan, 1996; Stepan, 1988）。這些理論雖源自不同歷史脈絡，但對於理解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政權，仍具有高度啟發性。

本文的核心問題有三：第一，2004年《未來中國》以「退化的極權主義」理解中共十六大前後的政體特徵（林佳龍，2004），哪些判斷仍具解釋力，哪些預期需要依據二十餘年的歷史經驗加以修正？第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深度嵌入全球化，以及數位科技快速進展，如何改變黨國的資源基礎、治理能力與社會控制方式？第三，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究竟是傳統威權、後極權、極權復辟，還是一種尚在形成、內部矛盾並存的新型黨國體制？

本文主張，中共政權的演變不是「極權必然退化、退化必然自由化」的單線過程，而是一條可能逆轉、重組與再集權的非線性路徑。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極權，在改革開放後轉為後極權與制度化黨國威權；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則在全球化與高速成長條件下形成「發展型後極權」；習近平上台後，政權再由發展導向轉向安全導向，由有限制度化轉向個人集權，由選擇性控制轉向數位化、國安化的全域控制。

因此，本文使用「新極權化」而非「新極權政體」作為核心概念。前者強調的是方向、過程與程度，而非宣稱一個全然完成且穩定的新類型已經形成。習近平體

制仍保留市場、專業官僚、地方治理、全球供應鏈與改革時期的制度遺產，也持續受到經濟效率、社會複雜性、官僚能力與國際依賴的制約；然而，其政治運作邏輯已明顯朝向黨領一切、領袖定錨、科技賦能、民族主義動員與國安治理全面擴張。

既有研究與人權報告顯示，習近平時代的權力集中、公民社會壓縮、數位監控、跨國鎮壓及新疆、西藏、香港治理的國安化，均已超越一般威權鞏固的範圍（Freedom House, 2026a; Human Rights Watch, 2026）。然而，高度控制並不等於高度穩定。個人集權與列寧式組織的結合，一方面提高政策動員與壓制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資訊失真、官僚消極、菁英不安全、政策僵化與接班風險。理解這種「能力增強與制度脆弱並存」的雙重性，是判斷中共未來發展的關鍵。

對台灣而言，理解這一變化不只是學術問題，更是國家安全問題。當中共政權從發展型威權轉向安全型新極權，其對外行為也將更具侵略性、統一戰線化與長期消耗性。台灣面對的，已不只是軍事威脅，而是一套結合軍事壓力、法律戰、認知戰、經濟脅迫、外交孤立、科技滲透與社會分化的整體性挑戰。因此，重新理解習近平時代的政體性質，是台灣制定國安戰略、強化民主韌性、拓展國際連結與建構文明敘事的前提。

貳、從「退化的極權主義」到「新極權化」： 二十餘年的理論修正

一、「退化」的原義：極權性的鬆動，不是國家能力的衰退

《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林佳龍，2004）出版於中共十六大前後。當時的核心觀察是：改革開放已使毛澤東時代的古典極權結構發生實質變化。革命意識形態的動員力下降，黨國官僚化與專業分工上升，社會與市場出現有限多元，政權合法性也逐漸由階級革命轉向經濟績效、秩序與民族發展。所謂「退化」，指的是古典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領袖崇拜、群眾動員及全面控制能力的鬆動，而不是中國國家能力、經濟實力或組織資源必然衰退。

這個區分十分重要。極權性可能退化，國家能力卻可能同步增強；政治控制可

能在某一階段鬆動，也可能在新的資源與技術條件下重新集中。因此，2004 年的分析正確掌握了改革時期中共與毛式極權的差異，但若進一步推論市場化、社會多元化與全球化將線性促成自由化，則低估了黨國重新吸收、利用並改造這些力量的能力。

二、未被充分估計的第一個變數：加入 WTO 與國家能力再造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快速取得全球市場、外資、技術、管理經驗與出口紅利。這些資源並未單純擴大市場與中產階級，也同時壯大中央財政、國有企業、科技基礎設施、公安國安體系與黨國組織能力。全球化不僅改變中國社會，也強化了中共治理中國的物質基礎。

因此，中國的市場化沒有自然轉化為政治自由化。中共逐步學會在不放棄一黨專政的前提下運用資本主義：容許市場創造財富，再透過黨組織、產業政策、金融控制、國有資本與監管權力重新支配市場。由此形成的不是市場限制政治，而是黨國重塑市場；不是資本主義取代列寧主義，而是列寧式黨國吸收資本主義工具。本文將江胡時期這種結合高速發展、有限制度化與選擇性政治控制的型態稱為「發展型後極權」。

三、未被充分估計的第二個變數：數位科技與控制能力革命

網際網路初期曾被普遍期待為資訊開放與社會自主的推力，但中國的後續發展顯示，數位科技同樣可以成為威權國家重建控制的工具。防火長城、實名制、平臺監管、行動支付、人臉辨識、大數據分析、演算法審查與人工智慧監測，使黨國得以把傳統的戶籍、單位、檔案與群眾組織，升級為即時、預測性、低可見度的社會治理系統。

新科技降低了全面控制的邊際成本，也改變了恐懼的運作方式。國家不必持續發動毛式群眾運動，便能透過資料蒐集、風險標記、網路刪控、平臺責任與精準鎮壓，在集體行動形成之前予以阻斷。這使後極權社會原有的有限自主空間，可能被重新政治化、組織化與國安化。

四、非線性政體演變：從後極權、發展型後極權到新極權化

綜合而言，中共二十餘年的演變可分為三個相互連續、但並非必然遞進的階段：改革開放後的後極權化，十六大至十八大前後的發展型後極權，以及習近平時代的新極權化。這三者不是彼此完全斷裂的政體，而是列寧式黨國在不同經濟、科技、社會與國際條件下的調適型態。有關中共政體於不同時期的演變情形，請見表 1。

這也意味著，習近平的新極權化既具有「進化」的一面，也具有「退化」的一面。就控制工具、組織滲透、資源動員與國際投射能力而言，它比傳統極權更現代化、更技術化；就制度化、資訊品質、政策彈性、菁英安全與接班規範而言，它又可能退化為更個人化、更僵化且更容易誤判的統治。因而，評估中共不能只問它變強或變弱，而應同時分析其控制能力的增長與制度理性的流失。

五、習近平體制的連續性、未完成性與內在矛盾

習近平並未創造一個與過去完全斷裂的新政體。他的權力仍建立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幹部制度、軍隊領導、宣傳國安機器與改革開放累積的經濟科技能力之上。新極權化是列寧式體制在新條件下的再集中，而不是憑空出現的制度創造。

表 1

中共政體演變的三階段分析架構

階段	大致時期	合法性核心	控制方式	主要矛盾
後極權	1978-2001	改革、秩序、經濟改善	官僚化黨國、選擇性壓制	市場與黨國、制度化與一黨專政
發展型後極權	2001-2012	高速成長、全球化、民族發展	有限制度化、國家資本與網路管制	社會多元擴張與政治壟斷並存
新極權化	2012- 至今	民族復興、國家安全、領袖核心	數位監控、國安治理、黨領一切	控制能力增強與制度理性流失

註：此一分期是分析性理想類型，各階段具有重疊與路徑依賴，並非彼此截然斷裂。

同時，這個體制尚未完成穩定化。市場與安全、專業治理與政治忠誠、全球依賴與科技自主、集體組織與個人權威、經濟績效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持續張力。習近平可以集中權力，卻未必能解決接班；可以壓低異議，卻未必能取得真實資訊；可以動員資源，卻可能傷害創新與信任。正因如此，「新極權化」應被理解為一個具有方向性但結果未定、能力與脆弱性並存的動態過程。

參、從 Linz 政體類型學看中共政權演變

Linz 對非民主政體的研究，重要之處不僅在於區分民主與非民主，更在於進一步拆解非民主政體內部的差異。不同的非民主政體，除了壓制程度高低不同外，在意識形態、領導結構、社會控制、政治動員與制度化程度上亦具有本質差異。

在 Linz 的分類中，極權主義具有完整且強制性的意識形態、單一政黨壟斷、恐怖統治、全面社會動員與領袖崇拜；威權主義通常缺乏完整的動員性意識形態，容許有限多元主義，但排除真正的政治競爭；後極權主義是極權體制在意識形態退潮、官僚化擴張與社會動員冷卻後所形成的殘餘型態；蘇丹式政權則以個人任意統治、家產化權力與制度空洞化為主要特徵。

以此觀察中共政權的歷史演變，毛澤東時代具有高度極權主義特徵。當時的中共政權以黨國合一為組織基礎，以領袖崇拜為政治核心，以階級鬥爭與思想改造為統治工具，並透過群眾動員、政治運動與恐怖政治，深入控制社會各個層面。

鄧小平以後，中共並未走向民主化，但其統治型態逐步轉向較制度化的後極權或威權化階段。意識形態不再居於唯一核心位置，經濟績效成為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來源；黨內形成有限的集體領導、任期安排與接班規範；市場、社會與地方治理也獲得相對有限的操作空間。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的中共政權，雖仍是專制體制，但可被理解為「列寧式黨國威權」與「後極權官僚體制」的混合型態。

習近平時代的關鍵特殊性，在於它並非延續後極權體制的冷卻與制度化，而是逆轉其發展方向。習近平重新強調「黨對一切的領導」，壓縮市場、社會、地方與專業官僚的自主空間，恢復意識形態教育與領袖核心地位，並透過反腐、國安、監控、網路審查、社會信用、長臂管轄及跨國鎮壓等工具，重建黨國對社會與個人的

全域控制。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將「民族復興」與「統一台灣」緊密連結為政權合法性的核心敘事，使對外鬥爭超越了外交政策的範疇，成為維繫內部統治與動員社會的重要機制。在此脈絡下，台灣議題已成為習近平政權鞏固權威、延伸民族主義動員，以及合理化國安化治理的重要支柱。

因此，本文將習近平政權界定為一個處於「新極權化」過程中的黨國個人集權體制：它以列寧式黨國為組織骨幹，以個人化領袖權威為權力核心，以民族復興與國家安全為合法性基礎，以數位監控、國家資本與國安治理為技術手段，並以對外鬥爭與統一台灣作為重要戰略目標。此一定義刻意保留「化」字，旨在凸顯其方向性、未完成性與內在矛盾。

之所以使用「新極權化」而非「完全極權」或「新極權政體」，是因為今日中國仍保留市場經濟、專業官僚、地方治理、科技產業與全球經濟連結，也仍受改革開放制度遺產與複雜社會結構制約。它不是毛澤東式革命極權的原貌復歸，而是黨國在市場化、全球化與數位化條件下，試圖重建更高密度控制的政治過程。

換言之，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政權，既非單純延續過去的威權體制，也非毛澤東時代的原貌復歸，而是在列寧式黨國基礎上，吸收改革時期累積的市場資源、科技能力與全球連結，再將其轉化為黨國控制與國際競爭工具。其現代化的控制能力與退化的制度理性同時存在，正是理解其強勢與脆弱的核心。

肆、習近平政權的五重性質

一、列寧式黨國：黨高於國家、法律與社會

習近平時代中共政權的根本骨架，仍是列寧式一黨專政。其核心邏輯在於：黨不僅是國家體制中的一個政治組織，黨是凌駕於國家、法律與社會之上的最高權力來源。全國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軍隊、媒體、學校、企業、工會與社會組織，皆被納入黨的領導體系之中。

BTI 2026 中國報告指出，中國憲法雖形式上規定不同國家機關的權限，但同時

確認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地位，因此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權力分立與制衡；在習近平時代，權力更進一步向黨中央與最高領導人集中，黨也更深度主導所謂「法治」建設（Bertelsmann Stiftung, 2026）。

這一體制不同於一般軍政府或傳統個人獨裁。中共不是單純依靠強人命令統治，而是透過組織系統、幹部任命、紀律檢查、黨組織滲透、統一戰線、宣傳系統、公安與國安機制，形成一套高度組織化、制度化且滲透性的統治機器。這使中共的治理能力高於許多傳統威權體制，也使其政權轉型更加困難。

換言之，習近平的個人集權並不是建立在制度瓦解之上，而是寄生並強化於列寧式黨國體制之內。黨國機器提供其集權的組織基礎，而個人權威則進一步壓縮黨內制度化空間，使中共政權呈現「組織高度動員、權力高度集中」的雙重特徵。

二、後極權體制的逆轉：從制度化威權回到意識形態控制

鄧小平以後，中共透過經濟改革與有限制度化，逐步降低毛澤東時代極權體制的政治動員強度。人民雖無法自由參政，但日常生活、市場活動與部分社會空間相對去政治化；政權合法性也從革命意識形態轉向經濟績效、社會穩定與民族發展。

習近平時代的特殊性，在於它並未延續後極權體制的冷卻與制度化，而是逆轉其發展方向。黨史教育、習近平思想、愛國主義教育、網路審查、校園控制、宗教中國化、香港國安法體制，以及對媒體、民營企業、平臺經濟與公民社會的全面整肅，皆顯示中共已不再滿足於人民的政治服從，而是重新要求思想、文化、社會、經濟乃至海外華人社群都被納入黨國敘事之中。

這是後極權體制的逆轉。中共正在重建一個意識形態化、組織化、國安化與監控化的全域政治秩序，其目標不只是防止反對派出現，而是使社會不再擁有形成自主思想、自主組織與自主動員的條件。

因此，習近平時代的中共政權並非單純回到毛澤東式革命極權，而是在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市場社會與科技治理基礎上，重新植入意識形態與國安邏輯，建構出一種更精緻、更技術化的新型控制模式。

三、個人化獨裁：從集體領導到一尊體制

習近平政權的第三項特徵，是從集體領導走向個人化獨裁。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取得第三任期，並在黨、軍、國安、宣傳、外交、經濟治理等關鍵領域全面集中權力。BTI 2026 指出，習近平取得第三任期及相關人事安排，反映中國政治領導層進一步權力集中（Bertelsmann Stiftung, 2026）。

然而，習近平政權仍不同於典型的蘇丹式政權。中國仍有龐大的官僚體系、黨內程序、組織紀律與政策機器，並非完全依靠領袖個人任意統治。但在制度外殼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實質決策愈來愈依賴最高領導人的意志、安全判斷與政治偏好。忠誠審查、反腐清洗、親信政治與領袖崇拜，使中共政權呈現「制度外殼仍在，個人化權力上升」的混合型態。

個人化集權的最大風險，在於資訊失真與決策誤判。當官僚體系害怕提供壞消息，軍方高層因持續清洗而缺乏安全感，地方政府以表態忠誠取代實質治理，政策系統便容易向最高領導人回報其想聽見的資訊，而不是國家真實面對的問題。

這種體制雖可在短期內強化動員效率與政策貫徹，但長期而言，將削弱政權的自我修正能力。尤其在經濟下行、社會壓力升高、國際衝突增加與台海風險升高的情境下，個人化集權可能使中共更難承認錯誤，也更容易採取高風險決策。

四、數位極權：從事後鎮壓到事前治理

習近平政權的新特徵，在於將傳統黨國控制與數位科技深度結合。毛澤東時代依靠戶籍、單位、檔案、群眾組織與秘密警察；習近平時代則在此基礎上加入人臉辨識、大數據分析、演算法審查、網路輿情監控、平臺治理、社會信用、AI 監測與跨境數位壓迫。

這種治理模式的核心，在於將社會控制從「事後鎮壓」推進到「事前預防」。透過大數據、全面監控與演算法分析，國家得以提前辨識潛在風險人群、議題與場域，並在集體行動尚未形成之前即加以化解與壓制。

所謂數位極權，也不應被理解為科技中立下的治理現代化，而是科技能力與黨國權力深度融合的結果。它使國家能更細緻地監控社會，更快速地壓制異議，也

使人民在尚未採取行動之前，就已進入自我審查的狀態。當人們無法確定自己的言論、行動、消費、社交與數位足跡是否會被記錄、評分或懲罰時，恐懼便不再需要透過大規模恐怖政治持續展演，而會內化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約束。

這是習近平時代與傳統威權體制最大的差異之一。中共不只是使用科技提高行政效率，而是把科技作為政治安全、社會控制與意識形態治理的基礎設施。

五、民族主義與文明敘事：合法性的重新建構

在經濟成長放緩、人口老化、青年失業、地方債務升高與國際環境惡化的背景下，中共愈來愈依賴民族主義與文明敘事來維繫政權合法性。習近平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祖國統一」相互連結，試圖塑造中國不只是發展中國家，而是能夠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與「中國秩序」的文明型大國。

在這套敘事中，中共不再只是以經濟成長證明其治理績效，而是主張中國代表一種不同於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它宣稱中國式現代化可以在不民主化的前提下達成國家富強、社會穩定與文明復興，並試圖將此模式推向全球南方與威權治理需求較高的國家。

2026 年中共建黨 105 週年相關講話中，習近平再次強調黨必須適應變局、維持紀律、清除腐敗，並重申解決台灣問題與實現統一的戰略目標。相關國際媒體報導亦指出，習近平以中國快速工業化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模式，強調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並同時推進軍事現代化與統一台灣的政治目標。

在此背景下，台灣議題早已超越領土爭端或兩岸關係的範疇，成為中共政權合法性、「民族復興」敘事，以及其所欲塑造國際秩序的重要象徵。對習近平而言，統一台灣被納入「民族復興」的歷史終局；對中共政權而言，統一台灣被塑造成證明其統治能力、歷史正當性與文明崛起的關鍵任務。

正因如此，台灣承受涉及政體性質、統治邏輯與文明敘事交織而成的長期壓力。理解習近平政權的五重特質，有助於我們更準確掌握中共對台政策的內在驅動力。其對台作為既非偶發性的外交強硬，也不限於軍事擴張，而是新極權體制在內部合法性、外部競爭與歷史敘事交互作用下，所展開的一套系統性對台施壓。

伍、習近平時代的政體變遷方向

一、從經濟績效合法性轉向安全合法性

改革開放後，中共長期以經濟成長換取政治服從。人民不能自由選擇政府，但只要經濟持續成長、生活水準改善、社會流動仍有期待，政權便能以「發展」作為合法性基礎。

然而，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正面臨經濟放緩、房地產危機、地方債務、青年失業、外資疑慮、人口老化與國際科技封鎖等多重壓力。當經濟績效不再足以穩定支撐政權合法性，中共便更依賴國家安全、反腐敗、民族復興與對外鬥爭，重新建構統治正當性。

這使中國治理邏輯從「發展壓倒一切」轉向「安全壓倒一切」。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金融、外交、社會治理與人民日常生活，都被納入國安架構之中。此一變化雖可提高國家動員能力，卻也壓縮市場活力、社會信任與制度彈性。當安全成為最高原則，政策理性便容易被政治忠誠取代，經濟效率也會讓位於維繫政權穩定。

二、從集體領導轉向一尊體制

改革開放後，中共曾形成有限的集體領導、退休規範、派系平衡與接班慣例。這些安排並非民主制度，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個人獨裁，並為黨國體制提供基本的權力可預測性。

習近平時代，這些制度性約束被大幅削弱。政治忠誠高於專業能力，安全考量高於制度程序，個人權威高於集體決策。2026年6月，中國撤除多名高階官員與軍方人士的人大代表職務，包括多名軍方高層，顯示反腐與軍中整肅仍在持續。

此一現象反映的，不只是習近平權力穩固，也可能是政權內部信任不足。高度集權並不必然等於高度穩定；相反地，愈需要持續清洗，愈顯示體制內部存在不安全感。政權表面上更加集中，內部卻可能因恐懼、猜忌與資訊封閉而更加脆弱。

對外部觀察者而言，不能只看到中共權力集中後的行動能力，也必須看到一尊體制所帶來的決策風險。當制度制衡被削弱，錯誤判斷便更難被及時修正。

三、從改革開放轉向國家資本主義與科技民族主義

中共仍需要市場，但市場必須服從黨。平臺經濟、民營企業、金融資本、教育產業與科技公司，均被要求配合國家戰略與政權安全。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科技、太空、軍民融合與數位基礎設施，則成為科技民族主義與國家安全的核心領域。

這種模式可能使中國在特定戰略產業形成高度集中投資與局部突破能力，但也會削弱企業家精神、創新自由與國際信任。當企業不再只是市場主體，而被視為黨國戰略工具，外資與外國政府便愈來愈難將中國視為單純市場，而會將其視為制度性風險與國安風險。

從二十餘年的發展回看，中共並非被市場經濟改造，而是逐步學會運用市場、資本與全球供應鏈服務黨國目標。市場可以存在，但必須接受黨的政治邊界；企業可以成長，但必須承擔國家戰略與政治忠誠義務。這是「發展型後極權」得以轉向「新極權化」的重要制度橋樑。

因此，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經濟，逐步走向以黨國安全為核心、國家資本為工具、科技自主為目標、全球競爭為場域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

四、從韜光養晦轉向鬥爭外交與秩序競爭

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不僅尋求融入既有國際體系，更試圖改寫其規則。中國透過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以及一帶一路、金磚、上海合作組織與全球南方敘事，挑戰美國與民主國家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

2026年以來，習近平密集接待多國領導人，特別是中等強國、全球南方國家與威權政權，試圖塑造中國作為美國之外的穩定替代中心。這顯示中共的對外戰略，已從追求經濟利益與國際承認，擴大為制度競爭、秩序競爭與文明敘事競爭。

在這樣的發展脈絡下，中國外交也已超越傳統國家利益的追求，成為中共政權

合法性向外延伸的重要載體，以及其國際秩序想像的具體實踐。對民主國家而言，北京帶來的挑戰涵蓋軍事、經濟、科技與制度層面，更直接衝擊自由、民主、法治、人權與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五、從統戰台灣轉向準戰爭化壓迫

中共對台政策也從過去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主軸的統戰思維，逐步演變為結合法律戰、認知戰、灰色地帶軍事施壓、外交封鎖、經濟脅迫、長臂管轄、跨國鎮壓、扭曲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以及對台灣民主選擇進行刑事化威脅的準戰爭化壓迫。

其目的未必是立即發動全面戰爭，而是透過長期、複合、低烈度但高強度的壓迫，逐步壓縮台灣主權行使的空間，削弱台灣人民信心，孤立台灣國際地位，並讓塑造「統一終將不可避免」的心理預期。

因此，台灣面對的是一場橫跨軍事、外交、法律、經濟、資訊與社會心理層面的長期消耗戰。中共對台壓迫已由單純統戰升高為整體性的國家脅迫，台灣的回應也必須同步提升為涵蓋國家安全、民主韌性、國際連結與社會信心的整體戰略。

陸、未來可能路徑與情境推演

一、情境一：高壓穩定與長期新極權化

中短期而言，最可能出現的情境，是中共透過黨、軍、警、國安、宣傳、數位監控與民族主義，維持一種高壓穩定的新極權化體制。即使中國經濟持續放緩，也未必立即導致政權崩潰。中共仍具備強大的組織能力、資源動員能力、社會控制能力與鎮壓能力，反對力量也難以在高度監控環境下形成全國性串連。

此一情境的優勢在於統治機器仍然有效，鎮壓成本可由體制內部吸收；弱點則在於資訊失真、官僚消極、創新受限、社會信任下降與政策自我修正能力衰退。

對台灣而言，這代表中共壓力將長期存在。台灣不能把國家戰略建立在「中國即將崩潰」的假設上，而必須準備面對一個長期高壓、長期競爭、長期滲透且長期

消耗的中國。台灣的核心任務，是建立足以承受長期壓力的國防、經濟、社會、外交與民主韌性。

二、情境二：停滯型後極權與外強中乾

第二種可能，是中國逐步進入類似蘇聯晚期或東歐後期的停滯型後極權狀態。表面控制仍然強大，國家機器仍可壓制反對力量，但社會冷感、青年躺平、資本外流、地方財政惡化、官僚怠工與人口危機，將使政權愈來愈依賴宣傳、民族主義與安全機器維繫統治。

在此情境下，中共未必立即對台發動全面軍事行動，但可能更頻繁利用對外衝突、民族主義動員與灰色地帶壓迫轉移內部壓力。其風險不在於中國一定會速戰速決，而在於北京可能把長期對台施壓視為維持內部凝聚與政權合法性的工具。

因此，台灣須防範的不是單一時間點的戰爭風險，而是「不戰而困」與「長期消耗」。中共可能透過軍機艦擾台、經濟制裁、國際打壓、資訊操作與法律戰，讓台灣社會逐漸疲乏、分化與失去信心。對此，台灣必須把韌性建設視為國家戰略，而非危機發生後的臨時補救。

三、情境三：個人化決策導致重大誤判

第三種情境，也是台灣最需警戒的情境，是個人化集權導致重大戰略誤判。個人獨裁最大的危險，不一定是領導人必然想發動戰爭，而是在危機時缺乏制衡、缺乏真實資訊，也缺乏承認錯誤與調整政策的制度能力。

若習近平周邊只剩忠誠官僚，軍方因整肅而充滿恐懼，地方政府只會表態效忠，外交系統只回報有利訊息，最高領導人便可能高估中國軍事能力，低估台灣抵抗意志，低估美日介入可能，也低估國際制裁與長期戰爭成本。

這是台灣最需嚴肅面對的風險。中共未必具備速勝能力，但個人化獨裁可能把政治壓力誤判為戰略機會，把民族主義動員誤判為軍事可行性，把民主社會的開放辯論誤判為意志薄弱。台灣必須透過國防嚇阻、國際協作、社會韌性與清楚訊號，降低北京誤判空間。

四、情境四：菁英分裂與有限修正

第四種可能，是在經濟壓力、外交受挫、軍中整肅、繼承問題與社會不滿累積下，中共內部出現路線修正。這種修正未必導向民主化，較可能是去個人化、再制度化與技術官僚回歸。其目標不是還權於民，而是救黨、穩黨與延續黨國體制。

在此情境下，中共可能降低部分對外衝突強度，重新強調經濟發展、外資信心與國際關係修補，以避免政權承受過高壓力。對台灣而言，這可能降低短期軍事風險，但不代表中國放棄統一目標，也不代表中共政權本質發生根本改變。

因此，台灣不應對中共改革抱持幻想。即使北京出現有限修正，台灣仍須堅持主權立場、強化國際支持、維持民主制度優勢，並持續推動國家安全與社會韌性建設。

五、情境五：突發危機與政權轉型

第五種情境機率較低，但不可排除。金融危機、地方財政崩解、大規模抗議、軍事失利、最高領導人健康問題或接班危機，都可能引發體制震盪。Linz 與 Stepan 的理論提醒我們，非民主政體的轉型不會自動發生，而取決於黨內裂解、社會動員、國家能力、國際環境與替代制度方案之間的互動。

若中國發生劇烈變化，台灣既有機會，也有風險。機會在於中國對外壓迫可能下降，國際社會也可能重新評估台灣在區域秩序與民主陣營中的地位；風險則在於中共或繼任集團可能利用對台危機維繫內部團結，將外部衝突作為轉移內部矛盾的工具。

因此，台灣對中國變局的態度，不應是被動等待，也不應是過度樂觀，而是必須建立情境推演、危機管理、國際協調與社會溝通機制。中國若長期高壓，台灣要能承受；中國若外強中乾，台灣要能防範消耗；中國若發生誤判，台灣要能嚇阻；中國若出現修正，台灣要能把握戰略空間；中國若發生突發轉型，台灣更要有能力穩住自己、連結國際，避免被動捲入中共內部危機。

總結而言，習近平時代的政體變遷方向，並非單純走向穩定或崩潰，而是在新極權化、高壓穩定、制度停滯、個人化誤判與可能修正之間擺盪。台灣最重要的戰

略判斷，是不把希望寄託於中國自動改變，而是以自身民主韌性、國防嚇阻、經濟安全與國際連結，主動塑造有利於台灣生存與發展的戰略環境。

柒、對台灣的戰略影響

一、軍事壓力常態化

習近平時代的中共對台軍事壓力，已不再只是偶發性危機，而是逐步走向常態化、複合化與灰色地帶化。中共將持續透過軍機、軍艦、海警、無人機、火箭軍、網路攻擊、太空偵察與聯合演訓等方式，壓迫台灣周邊海空域，並逐步侵蝕台海現狀。

其目的不只是演練攻台，更是透過持續性消耗，增加台灣戰備負擔，製造社會疲乏，測試美日及國際社會反應，並讓中共軍事存在逐漸被錯誤視為「新常態」。這種壓力的本質，是以不斷逼近戰爭門檻但避免立即引爆全面衝突的方式，逐步壓縮台灣的安全空間與主權行使能力。

二、法律戰升級

中共對台法律戰也將持續升級。北京將透過《反分裂國家法》、所謂「懲獨」規範、長臂管轄、境外鎮壓與司法恐嚇，試圖把台灣人民的民主選擇刑事化、恐嚇化與國際化。

這是一種以國內法包裝侵略企圖的法律戰。其目的不是建立真正的法治，而是把中共單方面的政治主張偽裝成法律義務，進而壓縮台灣人民的表意自由、政治參與與國際往來空間。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法律問題，而是主權、防衛、民主與人權問題。

三、外交空間壓縮

中共將持續扭曲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將其錯誤包裝為「台灣屬於中國」的國際法依據，並透過經濟利益、政治壓力與外交恐嚇，迫使各國政府、國際組織、

企業、學術機構與民間團體進行自我審查。

這種操作的危險在於，它不只是壓縮台灣的邦交與國際參與，更企圖從根本上改寫國際社會對台灣地位的理解。若台灣不能在國際法、國際輿論與國際組織場域主動反制，中共敘事將持續侵蝕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與正當性。

因此，反制 2758 號決議錯誤敘事，已不是單一外交議題，而是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民主夥伴連結與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部分。

四、認知戰與社會分化

中共對台認知戰的目標，早已超越宣傳「統一」本身，更著重於削弱台灣人民對民主制度、國防能力與國際夥伴關係的信心。其操作包括散播「疑美論」、「疑日論」、「疑民主論」、「戰爭恐懼論」、「投降和平論」與「台灣孤立論」，企圖營造「抵抗無用、民主失能、盟友不可信、國防挑釁、投降才能和平」的心理氛圍。

認知戰真正鎖定的，是台灣社會的集體信任。當人民對政府、軍隊、司法、媒體、盟友以及民主制度逐漸失去信心，也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守護現有的生活方式，中共即使不訴諸武力，也可能達到削弱台灣抵抗意志的戰略目的。

因此，因應認知戰的關鍵，不僅在於查核假訊息，更在於重建社會信任、提升政府透明度、強化危機溝通能力，並讓人民充分理解台灣所面對的威脅，以及自身具備的防衛能力與國際支持。

五、經濟與科技脅迫

中共也將持續利用市場、供應鏈、投資、觀光、農漁產品、稀土與關鍵材料，製造台灣內部利益分化。北京的經濟手段不是單純貿易工具，而是政治脅迫工具；其目的在於讓特定產業、地方、企業或社群對中國形成依賴，再將依賴轉化為政治壓力。

台灣若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就會使內部社會更容易受到中共脅迫。因此，經濟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台灣必須持續降低對單一市場及關鍵供應鏈的依賴，同時強化在民主供應鏈、可信賴科技與關鍵產業中的戰略地位，提升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六、制度與文明敘事競爭

習近平政權試圖證明「中國式現代化」優於自由民主，並將其包裝成全球南方與威權治理國家的替代方案。這使兩岸競爭不只是軍事、外交或經濟競爭，更是制度與文明敘事的競爭。

台灣必須證明，自由民主、科技創新、社會信任、法治、人權、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能形成比極權黨國更穩定、更有創造力、更值得信賴的國家模式。Freedom House（2026b）對台灣的評估指出，台灣具有活躍的競爭性民主與定期和平政權輪替，但同時也面對中國政府影響政策、媒體與民主基礎設施的壓力。

因此，台灣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共體制敘事最直接的反證。台灣越能展現民主治理能力、科技創新能力與社會韌性，就越能向世界說明：華人社會不必然走向威權，中華文化不必然服從黨國，自由民主也不是西方專利，而是台灣人民以自身歷史經驗所選擇並守護的生活方式。

捌、台灣的因應戰略

一、戰略認知：不低估中共，也不神化中共

台灣面對中共，必須避免兩種錯誤判斷。第一種，是認為中共即將崩潰，因此可以鬆懈；第二種，是認為中共不可戰勝，因此陷入恐懼。前者會導致戰略輕忽，後者會造成心理投降。

較準確的判斷應是：中共是一個高能力、高壓迫、高風險、低信任的政權。它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資源集中能力、軍事擴張能力與社會控制能力；但同時也存在資訊失真、權力過度集中、經濟結構惡化、人口壓力、社會信任不足與國際信任下降等深層弱點。

台灣的戰略不應建立在中國必然崩潰，也不應建立在中國永遠強大的假設上。正確方向，是看清中共能力，也看清其弱點；理解其壓迫性，也理解其脆弱性；既不自我麻痺，也不自我矮化。

二、國防嚇阻：建構可持久、可分散、可反制的防衛體系

國防建設方面，也應從軍購逐步發展為具備持久作戰、分散部署與有效反制能力的不對稱防衛體系。包括海空拒止、精準打擊、機動防空、無人載具、資安防護、後備改革、全民防衛、城市韌性、關鍵基礎設施保護及戰略物資儲備，都應納入整體規劃。

嚇阻的核心在於讓北京充分理解，武力犯台絕非一場短期軍事行動，而將引發長期抵抗、國際制裁、經濟重創、軍事風險升高，以及政權合法性受到衝擊等一連串難以承受的戰略代價。

台灣的防衛戰略，必須讓北京無法相信自己可以速戰速決、無法相信台灣社會會迅速崩潰、無法相信國際社會會袖手旁觀。唯有如此，才能降低中共誤判與冒進的可能性。

三、外交反制：破解 2758 號決議敘事與推動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應從法律、政治與制度三條線反制中共敘事。

法律上，台灣應持續闡明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只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並未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台灣，也未決定台灣主權歸屬。北京將 2758 號決議扭曲為「台灣屬於中國」的國際法依據，是政治操作，不是法律事實。

政治上，台灣應讓各國國會、政府、智庫、媒體與公民社會理解，台灣人民具有自我治理、民主選舉、國際參與與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利。台灣不是中國內政問題，而是印太和平、民主價值與國際秩序的重要議題。

制度上，台灣參與 WHO、ICAO、INTERPOL、UNFCCC 等國際組織，應被定位為全球公共利益、人權、安全與專業治理問題，而非兩岸政治讓步問題。當台灣被排除在國際機制之外，受損的不只是台灣人民，也是全球公共安全與國際制度本身。

四、經濟安全：從去風險到不可或缺

台灣不應只談降低對中國依賴，而要進一步建構自身對民主世界的不可或缺性。去風險只是防守，不可或缺才是戰略主動。

台灣應成為民主世界在半導體、人工智慧、資安、無人機、衛星、海纜、智慧醫療、電動車、能源韌性與可信資料中心上的關鍵夥伴。台灣的安全，不只來自地緣政治位置，也來自它能夠為世界提供什麼不可替代的價值。

這可以與「總合外交」、「三鏈戰略」與「榮邦計畫」結合，以民主鏈、經濟鏈、安全鏈連結 G7、歐洲、印太、友邦與全球南方夥伴。台灣不應只是被動面對中國威脅，而應主動提供民主世界解決方案，讓台灣成為可信賴供應鏈、非紅供應鏈與民主科技治理的重要節點。

五、社會韌性：抵抗認知戰的核心是信任

中共認知戰最希望瓦解的，同樣是台灣社會彼此之間的信任。一旦人民對政府、媒體、司法、軍隊、盟友及民主制度普遍失去信心，即使擁有再先進的武器裝備，也可能削弱整體防衛意志。

因此，社會韌性的核心是信任。台灣必須強化媒體識讀、透明政府、危機溝通、地方社群韌性、民防教育、跨黨派國安共識與民主程序信任。政府面對安全威脅時，必須誠實說明、即時溝通、有效治理，避免讓資訊真空成為認知戰操作空間。

抗中保台不能只是口號，更需要轉化為值得人民信任的治理能力。唯有政府誠信、施政有效、制度公平，才能降低認知戰的影響；唯有人民相信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值得共同守護，外部威脅才不易轉化為內部瓦解。

六、兩岸政策：反制極權，保留人民連結

台灣應清楚區分中共政權、中國社會與中國人民。對中共政權，台灣必須堅定嚇阻、反制滲透、揭露壓迫，並與國際民主夥伴共同維護台海和平；但對中國人民、知識界、地方社會與未來可能的改革力量，台灣仍應保留人道、文化、資訊與價值連結。

這是民主台灣的高度：反對極權，但不仇恨人民；反制侵略，但不放棄對自由的信念；守護台灣主權，但也相信中國人民有一天可能走向更開放、自由與多元的未來。

台灣與中共的對抗，不應被簡化為族群對立或文明仇恨，而是民主制度與極權黨國之間的價值競爭。台灣越能堅持自由、理性、人權與開放，就越能證明自己與中共政權的根本不同，也越能在長期競爭中取得道德、制度與國際支持上的優勢。

玖、結論：理論修正、戰略判斷與台灣的文明道路

總體而言，2004年《未來中國》提出的「退化極權主義」，仍準確指出改革開放後古典極權結構的鬆動（林佳龍，2004）；但二十餘年的歷史也顯示，極權性的退化並不必然導向民主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取得的全球化紅利，以及數位科技帶來的控制能力革命，使列寧式黨國得以在新的物質與技術基礎上重新集中權力。中共政權因而走過「後極權—發展型後極權—新極權化」的非線性路徑。

習近平體制不是單純回到毛澤東，也不是一個已經完成並穩定的新政體。它以列寧式黨國為連續性的制度骨幹，以個人集權、國家資本主義、科技民族主義、數位監控與國安治理作為再集中的工具；同時又承受市場活力下降、人口與債務壓力、官僚消極、資訊失真、菁英不安全與接班不確定等矛盾。其強大之處在於組織、資源與科技所支撐的控制能力；其脆弱之處則在制度理性、自我修正與權力交接機制的退化。

對台灣而言，這項理論修正具有直接的戰略意義。台灣既不能把希望寄託於市場化必然帶來中國自由化，也不能因中共控制能力增強而將其想像為毫無弱點的鐵板一塊。較準確的判斷是：台灣面對的是一個高能力、高壓迫、高風險，但同時低信任、低透明、低制衡且容易誤判的黨國體制。軍事威懾、法律戰、外交打壓、認知作戰、經濟脅迫、科技競爭與文明敘事，皆須放在此一政體邏輯下整體理解。

因此，台灣的戰略不能建立在中國崩潰論或中國不可戰勝論之上，而應以長期競爭與多重情境為前提：以民主制度鞏固社會韌性，以國防能力降低北京誤判，以經濟安全與科技優勢建立不可或缺性，以總合外交連結民主夥伴，並以國際法與戰略溝通破解中共對台灣及國際秩序的敘事。

換言之，台灣所守護的不僅是領土與主權，也是一條不同於黨國極權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經驗證明，市場、科技與國家能力本身不會自動產生自由；唯有民

主制度、法治、人權、公民社會與權力制衡，才能使現代化真正服務人的自由與尊嚴。

台灣的勝負，不僅取決於能否承受中共施加的壓力，更取決於能否以自身的民主治理、科技創新、社會信任與國際貢獻，證明自由制度具有比新極權化更高的調適力、創造力與正當性。這既是安全戰略，也是制度競爭與文明實踐。

這正是台灣在習近平時代所肩負的戰略使命，也是本文從「退化極權」走向「新極權化」理論修正的最終意義。

參考文獻

- 林佳龍（主編）（2004）。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時報文化。[Lin, C. L. (Ed.) (2004). *Weilai zhongguo: Tuihua de jiquan zhuy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Bertelsmann Stiftung. (2026). *BTI 2026 country report: China*. https://bti-project.org/fileadmin/api/content/en/downloads/reports/country_report_2026_CHN.pdf
- Freedom House. (2026a).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6: China*.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china/freedom-world/2026>
- Freedom House. (2026b).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6: Taiwan*.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y/taiwan/freedom-world/2026>
- Human Rights Watch. (2026). *World report 2026: China*.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26/country-chapters/china>
- Linz, J. J. (2000).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Linz, J. J., & Stepan, A.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tepan, A. (1988).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